

意识形态概念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文学变迁

李紫娟, 孟桢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3; 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湖南长沙, 410003)

摘要:“意识形态”(Ideologie)作为马克思主义范畴中重要的概念之一, 伴随唯物史观的传播被引入中文语境就与文学发生关系。20世纪上半期, 文学与“意识形态”概念在中文语境的传播几乎发生了同步的变迁。最初, 文学理论家断定“文学是意识形态”, 但实质上这里的文学所指称的是“社会意识形式”(Bewußtseinsformen)。20世纪30年代, “Ideologie”被音译为“意德沃罗基”, 这时文学被指称为“意德沃罗基”(Ideologie)的一种, 这其实是在鼓动和倡导文学的意识形态性, 也是当时人们对文学实践功能的期待。20世纪40年代, 人们更习惯于把“Ideologie”意译为“观念形态”, 文学是“观念形态”作品的说法既赋予了文学意识形态的实践品格, 也说明了文学对社会现实具有能动性和超越性。而“意识形态”概念在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以及出现的对文学本质的不同表述,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意识形态; 文学; 变迁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6-0195-06

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是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庞杂、语义最含混、使用最频繁的概念之一。该概念自被引入中国就运用于文学领域。当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革命文学”在中国兴起,而“意识形态”一词作为当时具有很强的功能性色彩的概念,也得以在文学理论建构中获得进入文学本质表述的机会。而20世纪上半期,伴随“意识形态”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表述和指称以及理解上发生变化时,文学理论界对文学的界定和理解也同样发生了改变,从而出现了对文学本质的不同表述。可以说,这一时期“意识形态”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也正是文学话语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两者是同步进行的。文学界对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界定的事实不仅反映“意识形态”概念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发展转型的表现之一。而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发展变化,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意识形态”概念在中国变化的轨迹。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由来与阐释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是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提出

的。1796年,他在《意识形态的要素》(也曾译为《观念学要义》和《思想的要素》)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概念,自此“意识形态”概念的法文“idéologie”用法产生了。特拉西使用“idéologie”这一词汇表示的是“观念学”。特拉西开始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先河之后,这一概念便在各个国家、各个领域得以运用。随后,“意识形态”概念的英文“ideology”、德语“Ideologie”以及俄语“идеология”的表述以及用法也相继出现。而马克思不仅首次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使用,而且创制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德语词“ideologie”,从而开启了“意识形态”概念的现代意义。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所界定的内涵有三个方面:作为“虚假”的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和作为维护阶级的社会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意识形态”(ideologie)不仅成为一个在东西方都很流行的词汇,而且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很重要的学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这一传播过程中,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伴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根据革命的需要,赋予了“意识形态”概念新的性质和涵义,

收稿日期:2016-08-20;修回日期:2016-10-19

基金项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2015MZD027)

作者简介:李紫娟(1983-),女,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孟桢(1980-),女,湖南湘潭人,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行政伦理及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

从而使“意识形态”概念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早期的第二国际理论家首先在“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中推动了意识形态概念中立化的倾向。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名传播者，他们都十分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所以他们的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考茨基在对“意识形态”的使用中出现了“意识形态机构”“意识形态因素”这样的“中性”用法。

普列汉诺夫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表述从含义、功能以及与经济基础、科学的关系等方面都做了深入具体的分析。他首创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中性用法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标准用法。而且普列汉诺夫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论述对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列宁影响更大，从而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统一起来。列宁赋予了“意识形态”概念肯定的意义，他在使用此概念时，往往不带丝毫贬义。他把“意识形态”划分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和“非科学的意识形态”两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宗教意识形态是“虚假”和“非科学”的，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与客观真理和绝对自然相符合”^[1]，所以是“科学的意识形态”。

因“意识形态”本身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马克思使用这一概念后，不同学派的学者对此概念都有不同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多维度的视角诠释和发掘“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的阶级性逐渐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对“意识形态”的文化话语等的关注。西方早期马克思主义代表卢卡奇认为，“某种思想即使在社会上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它也不能直接变为意识形态。要变成意识形态，它就必须执行某种规定得非常确切的社会职能。”^[2]所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要变为“意识形态”就必须要为一定阶级或集团服务，并维持统治秩序。因此，意识形态是一个具有统治及秩序内涵的一种观念体系。不管它的性质如何，它都是为某种阶级服务建立的统治关系和物质关系，从而巩固它的统治和支配地位。

当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各种政治理论文献和社会政治生活中都耳熟能详，但它的起源和含义作为哲学词汇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时，就不是十分明确。正因为如此，究竟何为意识形态，可谓众说纷纭。当前，从总体来看，国内学界讨论意识形态的相关著作和论文比较多，而且这些著作和论文都涉及意识形态的不同方面。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国内学者形成了几种观点。第一，马克思是从否定意义出发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是一个贬义词。他

们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否定性或贬义性的概念，其实质是虚假的观念。而这种“虚假性”是意识形态概念的特征，这种“虚假”体现在认知上的虚假性和利益上的虚伪性；第二，马克思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一种是否定的，贬义用法，就是上述所论述的第一种观点的看法。另一种是中性的用法，是在描述性的意义上使用，把它作为马克思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来使用。从这种用法上看，这里的意识形态是指“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思想的上层建筑”；第三，把马克思“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体系”。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为人类思想和行为定向的价值体系。有些论者认为，它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3]。

二、意识形态概念与20世纪上半期文学的关系

20世纪初，在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影响下，文学理论界也经历着深刻的思想变革。而“意识形态”作为具有强烈功能色彩的概念在这一时期进入了文学表述的语境中，并与文学的界定产生了联系。“意识形态”概念一直都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而复杂的概念。这一概念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复杂性，致使在文学理论界产生了“文学是否是意识形态”“文学是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等长期纠缠不清的命题。因此，理清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对准确分析和回答文学的本质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文学是“意识形态”(Bewußtseinsformen)

汉语“意识形态”概念，是1919年陈溥贤在翻译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书时译介引入中文语境的。但最早把文学与“意识形态”概念联系起来的却是瞿秋白。1923年，他在《郑译〈灰色马〉序》一文中说，“每一派自成系统的‘社会思想’(Ideology)，必有一种普通的民众情绪为之先导，从此渐渐集中而成系统的理论，然此种情绪之发扬激励，本发于社会生活及经济动象的变化，所以能做社会思想的基础而推进实际运动。”^{[4](255)}在这里，他不仅首次把“ideology”英译为“社会思想”，而且把文学与“意识形态”(当时译为“社会思想”)结合起来，并进一步从文学与社会及“社会情绪”联系的视角出来考察文学对社会的能动作用。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系统的理论，它的形式是所谓的“学说”^{[4](1256)}，由“社会情绪”转变而生成，而“社会情绪”的表现则是文

学^{[4](256)}。瞿秋白还指出,“艺术是发生于经济关系的社会情绪之表现,又是调节情绪以适当时劳动组织法之工具。”^[5]由上可见,最初,在瞿秋白看来,虽然文学与意识形态两者有关联,但是通过“社会情绪表现”的文学与“社会思想”这两者是有本质差异的,不能等同起来,因而也是不能直接把文学称为意识形态,因为文学仅仅是形成意识形态的前奏和先导。

然而,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瞿秋白在使用文学的“社会情绪”之说时,却把“艺术”提高到了很重要的位置,认为艺术就是“意识形态”。他指出,“在众多的‘社会思想’(ideology)中,除了宗教及道德之外,‘艺术’便是里面最古老、最重要和最广泛的了。”^[6]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指出“文艺就是意识形态”,但已经间接寓意这种说法了。20 世纪 30 年代,瞿秋白直接使用中文“意识形态”一词替代“社会思想”一词来译“ideology”,并指出,“文艺现象就是‘意识形态的表现’”^{[7](515)},“艺术是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8],因此,它“能够影响社会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之内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加强或者削弱某一阶级的力量”^{[7](503)}。所以,这一时期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对社会革命斗争已经具有了推动作用。

那么,最初为什么文学理论家说“文学是意识形态”,其目的何在呢?“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概念,本身是功能色彩比较浓厚的一个术语。最初,由于译介过程中的误译,中文“意识形态”一词的内涵指的是“社会意识形式”(Bewußtseinformen)。而把文学表述为意识形态,其实是凸显文学的实践作用。我们知道,意识形态对社会实践具有能动作用,那么,把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来讲其实是凸显文学的实践作用,正如华汉所说,“整个社会是由阶级构成的社会,社会的一切意识形态的产生都是基于社会基础而来,同时也反映着构成社会的各阶级,并且还负有阶级的实践的任务。”^[12]可见,把文学表述为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运用“意识形态”概念来确立文学的实践功能。

2. 文学是“意德沃罗基”(Ideologie)的一种

当然,这一时期,还有把“意识形态”音译为“意德沃罗基”(Ideologie)的译法,这决定了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同的表述界定。1927 年,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说,“我们的文学运动现在的实况:内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ideologie 意德沃罗基)。”^[13]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成仿吾不仅将德语“Ideologie”译为“意德沃罗基”,而且率先将德语“Ideologie”与中文“意识形态”一词直接对应起来,同时也使得中文“意识形态”

一词与“意德沃罗基”的译法对应起来,因而导致这一时期的理论家虽然在同一篇文章中多次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却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指称。如 1928 年,克兴在《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革命文学底根本问题底考察》一文中,在引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所用的“意识形态”^[14]其实指的是社会的“意识形式”。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也可以找到“意识形态”是指“意德沃罗基”(Ideologie)的用法^[15],更有“革命文学与无产者文学同是宣传新意识形态底文学”^[16]的说法,但这里的“意识形态”一词所指称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因此,这一时期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非常混乱,从而导致文学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认定也在变化中。

伴随成仿吾将“Ideologie”译为“意德沃罗基”的译法的出现,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界定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中国早期阶段,又出现了“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的说法。1928 年,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首次提出“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17]。并指出,“文学,是生活意志的表现、是依据阶级的背景,成为一个阶级的武器。”^[18]所以“文学的社会任务,在于他的组织能力,所以支配阶级的文学,总是为它自己的阶级宣传,组织。”^[19]显然,这里的文学是具有阶级特点的,而“文学的阶级性反映的对象是客观现实和意识形态,而且文学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是受作者本身意识形态约束的。”^[20]

而对于“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的这种说法,当时的认识是非常模糊不清的。对于意识形态与文学的表述还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和认知。如有学者说,“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部门”^[21];也有理论家认为,“艺术是一种特殊产业的意识形态(Ideologie)种类”^[22];而瞿秋白则不仅认为艺术是“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表现,是上层建筑中最高的一层”^[23]。显然,瞿秋白这里对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阐述是把有差异的两个概念不进行区分混同起来使用,可见,当时文艺理论界对这两者的表述是不清晰的。但不管怎样,“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的说法所要表达的是鼓动和倡导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在文学理论家那里,把文学表述成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其实是在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就正如李初梨所认为的,“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所以文学是“反映阶级实践的意欲”,是“一个阶级的武器”,是“有意无意地在进行宣传”。^[24]可见,大多理论家在这一时期强调的艺术是为宣传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服务的。

3. 文学是“观念形态”(Ideologie)的作品

对于“*Ideologie*”概念,在中国早期的文学理论界还有一种习惯的意译法,就是把“*Ideologie*”意译为“观念形态”。1928年,李初梨指出,“一切的观念形态(*Ideologie*),都由社会的下层建筑所产生。”^[25]他直接把德语“*ideologie*”与“观念形态”一词对应起来。1937年,艾思奇也谈到,“‘观念形态’可以写做‘意识形态’,两个名词意思全然没有分别,代表某一集团的共同意识的形式。”^[28]“包括文学、哲学、科学、宗教、道德、法律。”^[29]艾思奇还指出,“文学是观念形态,唯美主义的文学代表着社会上某些寄生集团的共同意识,因为这些人生活脱离了现实。现实主义的文学是实践活动中的人们的主要的观念形态,因为这些人能够面对现实的。”^[30]从这里可以看出,艾思奇是把这两者统一起来作为“意识形态形式”来理解。那么,这里的“观念形态”(ideologie)也并非马克思真正意义的概念,而是跟早期的“误译”一样,指称的是“意识形式”(Bewußtseinsformen),因此,把文学作为观念形态,所表述的内涵其实寓意文学是社会的“意识形式”。

1942年,毛泽东指出,“文学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31]而他对文学的这一规定,是这样说的,文艺作品能够“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32]。这里他没“用‘意识形态’一词,就是直接使用‘观念形态’,但这里的‘观念形态’与上述艾思奇所论述的内涵是不同的,这里的‘观念形态’既有社会意识形式的意义,也有意识形态的内涵。而且这种‘观念形态’既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也体现了一种自觉的主张立场和价值观。因为这里的‘观念形态’的内涵所指不同,所以这里把‘文学作为观念形态的作品’,不再仅仅把文学作为简单的社会意识形式,并把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性特点肯定了下来,也说明了文艺对于生活的能动性和超越性。

总之,纵观20世纪上半期,从文学理论界对“文学是否是意识形态”“文学是意德沃罗基的一种”以及“文学是观念形态的作品”的讨论和界定来看,实际上就是人们对文学本质认识的改变。“意识形态”作为当时中文语境中一个新的具有阶级革命元素的概念,它是一个和现实、阶级实践联系在一起,带有阶级性特征的概念。而“意识形态”这一具有功能性特点的概念之所以被赋予文学上的意义,因为这一概念不仅为文学的阶级性提供了具有权威性的理论支撑,而且也为革命形势发展急需文学的能动作用和社会功能意

义提供了实践指导。把文学界定为意识形态,是通过“意识形态”概念来建构文学的阶级实践功能。不管是“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界定,还是“文学是观念形态的作品”的说法,其意义在于强调文学的阶级性特点,企图通过文学这种艺术作品让民众觉醒,从而共同来进行革命实践。也正因为如此,“文学是意识形态”或“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等说法在当时的中国非常受欢迎。

三、“意识形态”概念的传播对现代文学变迁的影响

众所周知,“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是个界定清晰、内涵丰富的概念组。20世纪上半期,这一概念进入中文语境时曾长期把“*Bewusstseinsformen*”误译为中文“意识形态”一词,有时又把“*ideologie*”和“*ideologisch*”也译为中文“意识形态”,而马克思真正意义上的“*Ideologie*”却是用中文的“观念形态”来表述。虽然之后经典著作文献把这一“误译”进行本位回归,即把“*ideologie*”译为“意识形态”,“*Bewusstseinsformen*”译为“意识形式”。但文学理论界在对“意识形态”一词进行使用时,却并没有对应起来。文学理论界正是受中国早期对意识形态概念“误译”的缘故,从而致使“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这样的界定却一直存在,并没有因为“意识形态”中文一词与“*ideologie*”的内涵真正对应起来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当大家都已经习惯于把“意识形态”概念看成单一的ideologie的译语时,文学理论界在使用“意识形态”术语时,仍然有时是作为ideologie来用,而有时却仍然指称的是Bewusstseinsformen(意识形式)。也正是因为这样,作为具有强烈功能色彩的“意识形态”概念与文学发生联系时,从而引起文学理论界对文学意识形态性的争论。而且,文学的变迁就一直伴随着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演变而变化,这在后来对文学本质变迁的论辩中得以体现。

建国以后,文学更被非常权威地界定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如20世纪60年代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中明确指出,“文学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还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33],包括“政治、法律的观点以及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等等”^[34]。不难看出,这里的“意识形态”正是今天所说的“社会意识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涵跟本应属于它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的形式”融合了。而20世纪70年代蔡仪在《文

学概论》一文中也写到,“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35]文中却没有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明确的界定。显然,不管是上述对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得出怎样的界定,其中的“意识形态”不仅是一个关键概念,也是一个复杂的词,跟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ideologie)是无法等同起来的。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界定更是当时的学者对苏联作家的著作进行翻译时,所做的一种误读或者误译。因为对于“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种提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找不到原始的文本依据的。那么为什么当时中国的文艺理论家还习惯于这样界定呢?这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意识形态”的论述被误读、误译了。20 世纪 50 年代由苏联学者格·索洛维耶夫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经由曹葆华从俄文译成中文在中国翻译出版。在中译本中,在前面“出版社的话”的论述中,明确提到“艺术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说法,然而到了书的目录和正文中,标题却被改为“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但在这一标题下的引文和论述中,都不能论证文艺可以界定为“社会意识形态”^[36]。而该书是 1962 年在中国出版的,对当时的中国学者影响很大。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编写的通用文学理论教科书就是该书影响下的成果。此书的编译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翻译,是因为受到了当时“意识形态”在最初汉语语境中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用法的影响。“意识形态”概念最初是中国学者在转译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时才被引入汉语语境,但在转译的过程中,译者误把“意识形式”译为“意识形态”,从而造成译法上的错位,致使中国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把“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式”来使用。20 世纪 50~60 年代把“文学界定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这一用法应该也是出于对这两个概念的误译,从而造成对“意识形态”概念产生误解。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思想的涌入,文学界开始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进行反思,从而引发了关于“文学是否是意识形态”的论争。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他们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考察,得出文艺具有意识形态性,但文艺的本质属性并不是意识形态。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概念是一种政治化的概念,使用这个概念来界定文学的本质,是一种把政治化的概念搪塞到文学体系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其实“抹杀了文学非意识形态超越现实的品格”^[37]。有学者直接提出,“文学并不是意识形态”^[38],而是“反映精神活动的高层次性”^[39]。虽然文学具有意识形态的某些特征和

属性,但并非所有作品都具有意识形态性。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一种“观念的东西”,与之相对应,“文艺是意识形态”这样的提法其实不是指文艺自身,而是指“文艺的观念(理论)体系”。而对文学意识形态性持肯定态度的一方把“意识形态”与“观念形态”一词等同起来运用。在文学与意识形态的论争中,持否定文学意识形态性的学者,则把“意识形态”概念视为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从而推动现代文学的变迁。相反,持肯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学者则是以取消或削弱“意识形态”的政治色彩作为应对否定论为代价。

之后,中国文学界又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40]的论断,从而引发争论。在这场关于文学本质的争论中,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讨论成为重中之重。在论辩过程中,坚持文学的本质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观点。他们共同强调“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整合的概念,并不是“审美”与“意识形态”的相加,而是明确把“‘审美意识形态’自身作为相对独立的统一整体的系统来看”^[41]。他们认为,文学就是通过“审美性”的路径而达到“意识形态性”。把文学本质定义为“审美意识形态”,其实质就是把它等同于“意识”或“意识形式”概念。就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文学的发展是从‘前文学’到文学,从中导出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性的观点……而意识形态这一观念,是后来才出现的现象。”^[42]文学的“审美性”包括了“意识形态性”。

总之,不管是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还是对“审美意识形态”,他们的论争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词汇“意识形态”,这也许就寓意着这几场论争与这一概念的关联性,而在上述的阐释中,我们也看到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正是这一概念。所以这场长达近 30 年的文学理论的讨论,其实质都是围绕“意识形态”概念进行的。而“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复杂的概念,自 20 世纪上半期与文学发生联系之后,文学的变迁就伴随着这一概念的内涵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意识形态”概念在 20 世纪初的“误译”,即把“意识形态”理解为“社会意识形式”的用法,一直到今天对我们理解这一概念都有影响,从而影响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概念这种明显的复义性的使用方式,对后来的学者对现代文学的理解仍然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因此,当今学者要对“文学是意识形态”进行界定辨析,应着重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对文学的本质进行准确的

参考文献:

- [1]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96.
- [2] 卢卡奇.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M]. 白锡堃, 张西平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487.
- [3] 郑永廷.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16-19.
- [4]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 [5] 瞿秋白. 社会科学概论[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 1925: 62.
- [6]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462.
- [7] 瞿秋白. 瞿秋白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8]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270.
- [9] 华汉. 文艺思潮的社会背景[J]. 流沙, 1928(2): 1-12.
- [10] 成仿吾.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J]. 创造月刊, 1928(9): 1-7.
- [11] “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2] 李初梨. 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J]. 文化批判, 1928(2): 3-20.
- [13] 陈寿立.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摘编(上)[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5: 378-381.
- [14] 彭康. 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J]. 创造月刊, 1928(4): 122-132.
- [15] 沈起予. 艺术运动底根本概念[J]. 创造月刊, 1928(3): 1-8.
- [16]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3册)[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140.
- [17] 艾思奇. 艾思奇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18] 艾思奇. 艾思奇全书(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368.
- [19]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0] 以群. 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3.
- [21] 蔡仪. 文学概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1.
- [22] 格·索洛维耶夫.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M]. 曹葆华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1-3.
- [23] 杨春时. 传统文艺学四概念辨析[J]. 北方论丛, 1991(1): 37-44.
- [24] 曾凡. 理性的迷误—和曾镇南同志商榷[J]. 文艺争鸣, 1988(3): 27-32.
- [25] 鲁枢元. 大地和云霓—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J]. 文艺争鸣, 1988(1): 14-16.
- [26]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75.
- [27] 童庆炳. 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J]. 学术研究, 2000(1): 105-112.
- [28] 钱中文. 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J]. 文学评论, 2007(1): 42-53.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and the change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wentieth century

LI Zijuan, MENG Zheng

(School of Marx, Bei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Hunan Social Sciences,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Ideology” (Ideologie),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cepts in Marx’s theory,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ese contex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and the spread of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underwent almost synchronous changes. At the very beginning, literary theorists concluded that “literature is ideology”, but in essence, the literature here referred to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form” (Bewußtseinformen). In the 1930s, the “Ideologie” was transliterated as “yi de wo luo ji,” and literature then was referred to as an “Ideologie” (Ideologie), which was in fact the ideology of agitation and advocacy of literature, and also people’s expect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in practice. In the 1940s, people were more accustomed to the translation of “Ideologie” for “ideology,” believing that “literature is the practical character of ideological works,” which not only endows literature with ideological practical character, but also discloses that literature has the initiative and transcendental function beyond social reality.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the process of spread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have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Key Words: ideology; literature; change

[编辑: 胡兴华]